

悼念忆：师友回忆录

季羨林 著
精装珍藏版

季羨林

悼念忆：师友回忆录

唯一亲定自选集
精装珍藏版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悼念忆: 师友回忆录: 精装珍藏版 / 季羨林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1

(季羨林唯一亲定自选集)

ISBN 978-7-213-06965-9

I . ①悼… II . ①季…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4841 号

书 名	悼念忆: 师友回忆录 (精装珍藏版)
作 者	季羨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陈巧丽
责任校对	鞠 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6965-9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做真实的自己（代序） /1

第一辑 我的先生们

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林教授 /5

西谛先生 /9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 /18

为胡适说几句话 /24

回忆吴宓先生 /30

忆念胡也频先生 /33

晚节善终 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38

回忆陈寅恪先生 /45

扫傅斯年先生墓 /58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63

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 /76

忆恩师董秋芳先生 /80

寅恪先生二三事 /83

追忆哈隆教授 /92

第二辑 同学少年

忆章用 /101

怀念衍梁 /113

怀念乔木 /117

悼组绌 /125

追忆李长之 /131

悼念周一良 /142

忆念张天麟 /147

第三辑 老友飘零

悼念曹老 /157

悼念姜椿芳同志 /161

悼许国璋先生 /164

悼念邓广铭先生 /172

悼念赵朴老 /177

忆老友于道泉 /181

痛悼钟敬文先生 /183

痛悼克家 /187

第四辑 回首士林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193

回忆梁实秋先生 /199

悼念沈从文先生 /203

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君培）先生 /209

寿作人 /216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 /223

郎静山先生 /228

我眼中的张中行 /232

回忆汤用彤先生 /239

赵元任先生 /249

跋 /263

做真实的自己

(代序)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有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绝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绝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绝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绝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季羡林

第一辑

／
我的先生们
／

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

昨天晚上接到我的老师西克先生 (Prof. Dr. Emil Sieg) 从德国来的信，说西克灵教授 (W. Siegling) 已经于去年春天去世，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生死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死也并不是没有差别。有的人死了，对国家、对世界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们只是在他们亲族的回忆里还会再生存一个时期，终于也就渐渐被遗忘了。有的人的死却对国家、对世界都是一个损失，连不认识他们的人都会觉得悲哀，何况认识他们的朋友们呢！

西克灵这名字，许多中国读者大概还不太生疏，虽然他一生所从事研究的学科可以说是很偏僻的。他是西克先生的学生。同他老师一样，他也是先研究梵文，然后才转到吐火罗语去的。转变点就在四十年前。当时德国的探险队在 Grünwedel 和 Ven LeCoq 领导之下，从中国的新疆发掘出了无量珍贵的用各种文字写的残卷并将其运到柏林去，德国学者虽然还不能读通这些文字，但他们却意识到这些残卷的重要性。当时柏林大学的梵文正教授 Pischel 就召集了许

多年轻的语言学者，尤其是梵文学者，来从事研究。西克和西克林决心合作研究的就是后来被定名为吐火罗语的一种语言。当时他们有的是幻想和精力，这种稍稍带点冒险意味，有的时候简直近于猜谜似的研究工作，更提高了他们的兴趣。他们日夜地工作，前途充满了光明。在三十多年以后，西克先生每次谈起来还不禁眉飞色舞，仿佛他自己又走向青春里去，当时热烈的情景就可以想见了。

他们这合作一直持续了几十年。他们终于把吐火罗语读通。在这期间，他们发表的震惊学术界的许多文章和书，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克林被征从军的一个时期外，都是用两个人的名字。西克林小心、谨慎，但没有什么创造的能力，同时又因为住在柏林，在普鲁士学士院 (Preussische Akademieder Wissenschaften) 里做事情，所以他的工作就偏重在研究抄写 Brāhmi 字母。他把这些原来是用 Brāhmi 字母写成的残卷用拉丁字母写出来寄给西克，西克就根据这些拉丁字母写成的稿子来研究文法，确定字义。但我并不是说西克林只懂字母而西克只懂文法。他们两方面都懂，只不过西克林偏重字母而西克偏重文法而已。

两个人的个性也非常不一样。我已经说到西克林小心、谨慎，其实这两个形容词是不够的。他有时候谨慎到我们不能想象的地步。根据许多别的文字，一个吐火罗字的字义明明是毫无疑问地可以确定了，但他偏怀疑、偏反对，无论如何也不承认。在这种情形下，西克先生看到写信已经没有效用，便只好坐上火车到柏林用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他。我常说，西克先生就像是火车头的蒸汽机，没有它火车当然不能走。但有时候走得太猛太快也会出毛病，这就用得

着一个停车的闸。西克灵就是这样的一个让车停的闸。

他们俩合作第一次出版的大著是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1921 年)。两本大著充分体现了这合作的成绩。在这书里他们还很少谈到文法，只不过把原来的 *Brāhmi* 字母改成拉丁字母，把每个应该分开来的字都分了而已。在 1931 年出版的 *Tocharische Gram-matik* 里面，他们才把吐火罗语的文法系统地整理出来。这里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他们还约上了大比较语言学家、柏林大学教授舒尔茨 (*Wilhelm Schulz*) 来合作。结果这一本五百多页的大著就成了欧洲学术界划时代的著作。一直到现在，研究中亚古代语言和比较语言的学者还不能离开它。

写到这里，读者或许会以为西克灵在这些工作上没有什么不得了的贡献，因为我上面曾说到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抄写 *Brāhmi* 字母。这种想法是错的。*Brāhmi* 字母并不像我们知道的这些字母一样，它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候两个字母的区别非常细微，譬如说 *t* 同 *n*，稍一不小心，立刻就会发生错误。法国的梵文学家莱维 (*Sylvain Lévi*) 在别的方面的成绩不能不算大，但看他出版的吐火罗语 *B* (龟兹语) 的残卷里有多少读错的地方，就可以知道只是读这字母也很不容易了。在这方面西克灵的造诣是非常惊人的，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也是为了读 *Brāhmi* 字母的问题，我在 1942 年的春天到柏林去看西克灵，在普鲁士学士院他的研究室里找到了他。他正在那里埋首工作，桌子上摆的、墙上挂的全是些 *Brāhmi* 字母的残卷，他就用他特有的蝇头般的小字一行一行地抄下来。在那以前，我就听说，只要有三个学生以上，他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所以他一生就只在学士院里工作，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在柏林大学里教过吐火罗语，

终于还是辞了职。见了面他给我的印象同传闻的一样，人很沉静，不大说话。问他问题，他却解释无遗。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读 Brāhmi 字母的秘诀。我发现他外表虽冷静，但骨子里却是个很热情的人，像一切良好的德国人一样。

不久，我离开柏林，回到哥廷根，战争愈来愈激烈，我就再也没能到柏林去看他。战争结束后，自己居然还活着，听说他也没被炸死，心里觉得非常高兴，我也就带了这高兴在去年夏天回了国。一转眼就过了半年，在这期间，因为又接触了一个新环境，整天糊里糊涂的，连回忆的余裕都没有了。最近，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于是又回忆到以前的许多事情，在德国遇到的许多师友的面影又不时在眼前晃动，想到以前过的那个幸福的时期，恨不能立刻再回到德国去。然而正是在这时候，我接到了西克先生的信，说西克灵已经去世了。即便我能立刻回到德国，师友里面也已经少了一个了。对学术界，尤其是对我自己，这个损失是再也不能弥补的了。

我现在唯一的安慰就是在西克先生身上了。他今年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但他的信上说，他的身体状况还很好。德国目前是既没有吃的穿的，也没有烧的。六七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以他这样的高龄，他居然还照常工作！他四十年来的一个合作者西克灵，比他小二十多岁的一个朋友，既然先他而死了，我只希望上苍还加佑他，让他再壮壮实实多活几年，把他们未完成的大作完成了，为学术、为他死去的朋友，我替他祈福。

1947年1月29日于北平

西谛先生

西谛先生不幸逝世，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听到飞机失事的消息时，我正在莫斯科。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我是震惊多于哀悼，惋惜胜过忆念，而且还有点儿惴惴不安。当我登上飞机回国时，同一架飞机中就放着西谛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我百感交集。当时我的心情之错综复杂可想而知。从那以后，在这样漫长的时间内，我不时想到西谛先生。每一想到，都不禁悲从中来。到了今天，震惊、惋惜之情已逝，而哀悼之意弥增。这哀悼，像烈酒，像火焰，燃烧着我的灵魂。

倘若论资排辈的话，西谛先生是我的老师。30年代初期，我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但是从小学起，我对中国文学就有浓厚的兴趣。西谛先生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我曾旁听过他的课。在课堂上，西谛先生是一个渊博的学者，掌握大量的资料，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泻水，滔滔不绝。他那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了教室的学生的神态，至今仍宛如在

目前。

当时的教授一般都有一点儿所谓“教授架子”。在中国话里，“架子”这个词儿同“面子”一样，是难以捉摸、难以形容描绘的，好像非常虚无缥缈，但它又确实存在。有极少数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质待遇却非常优厚。在他们心里，在别人眼中，他们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间烟火，而实则饱饕粱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确实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了令人羡慕的对象。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就产生了架子。

这些教授的对立面就是我们学生。我们的经济情况有好有坏，但是不富裕的占大多数，然而也不至于挨饿。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学生。处境相同，容易引起类似同病相怜的感情；爱好相同，又容易同声相求。因此，我就有了几个都是爱好文学的伙伴，经常在一起，其中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等。虽然我们所在的系不同，但却常常会面，有时在工字厅大厅中，有时在大礼堂里，有时又在荷花池旁“水木清华”的匾下。我们当时差不多都才20岁左右，阅世未深，尚无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我们经常高谈阔论，臧否天下人物，特别是古今文学家，直抒胸臆，全无顾忌。幼稚恐怕是难免的，但是没有一点儿框框，却也有可爱之处。我们好像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任性纵情，毫不矫饰。我们谈论《红楼梦》，我们谈论《水浒传》，我们谈论《儒林外史》，每个人都努力发一些怪论，“语不惊人死不休”。记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时，我们间曾掀起一场颇为热烈的大辩论，我们辩论的声音在工字厅大厅中回荡。但事过之后，谁也不再介意。我们有时候也把自己写的东西，什么诗歌

之类，拿给大家看，而且自己夸耀哪句是神来之笔，一点儿也不脸红。现在想来，好像是别人干的事，然而确实是自己干的事，这样的率真只在那时候能有，以后只能追忆珍惜了。

在当时的社会上，封建思想弥漫，论资排辈好像是天经地义。一个青年要想出头，那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没有奥援，不走门子，除了极个别的奇才异能之士外，谁也别想往上爬。那些少数出身于名门贵胄的子弟，他们丝毫也不担心，毕业后爷老子有的是钱，可以送他出洋镀金，回国后优缺美差在等待着他们。而绝大多数的青年经常为所谓“饭碗问题”担忧，我们也曾为“毕业即失业”这一句话吓得发抖。我们的一线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在我们眼中，教授简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们自然也是感觉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有架子，同这种情况是分不开的。我们对这种架子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认识西谛先生的。

最初我当然对他并不完全了解。但是同他一接触，我就感到他与别的教授不同，简直不像是一个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儿教授架子；他也没有一点儿论资排辈的恶习。他自己好像并不觉得比我们长一辈，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他有时就像一个小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说话非常坦率，有什么想法就说了出来，既不装腔作势，也不以势吓人。他从来不想教训人，任何时候都是亲切和蔼的。当时流行在社会上的那种帮派习气，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只要他认为有一技之长的，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他都一视同仁。因此，我们在背后就常常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他当时